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期俄国 农奴制的主要剥削形式及其趋势*

李振文

【内容提要】 俄国农奴制的主要剥削形式为代役制和劳役制，它们的分布与土壤、气候、经济、人口等因素相关。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期，出现了代役制萎缩和劳役制扩张的趋势，表明了农奴制的强化。代役制和劳役制在本质上都是地主凭借其强制权力向农民征收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的方式，但劳役制农民的负担更重。在市场关系的影响下，代役制农民积极参与工商业，促进了工业区的形成。在劳役制地区，农业生产商品化和专门化程度提高，市场的扩大和粮价的上涨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与此同时，代役制和劳役制农民的负担都不断加重，他们的受剥削程度也大大加深了。

【关键词】 俄国农民 农奴制经济 代役制 劳役制 剥削

【作者简介】 李振文，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在农奴制下，地主庄园的生产方式本质上以剥削农奴为目的。地主剥削农民的基本方式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民的经济状况，而且形成了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的不同特点，进而对 1861 年农民改革的基本内容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俄国农奴制的主要剥削形式 ——代役制和劳役制及其分布规律

1861 年废除农奴制以前，俄国地主剥削农民的方式有四类：代役制（оброк）、劳役制（барщина）、家奴制和工厂制^①。代役制农民主要为地主缴纳

*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宝贵意见，文中疏漏之处由作者承担。

① Заблоцкий - Десятовский А. П. Граф П. Д. Киселев и его время. Т. 1.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М. М. Стасюлевича. 1882. С. 276.

货币租，劳役制农民则为地主耕种土地，家奴主要是地主的仆役和工匠，工厂农民则在地主的工厂和矿场上做工。前三类农民生活在地主庄园，由内务部管辖；后一类则登记在地主占有的工厂，受财政部管理。代役制和劳役制农民都能从地主那里获得一定数量的份地，为此则必须为地主交租，只是交租的方式不同；家奴为地主提供日常服务，但没有土地，完全由地主供养。前两类农奴被法律统称为地主的农民（помещичьи крестьяне）。

根据1851年的第九次人口调查，欧俄47省的男性农奴为10 747 321人，其中男性代役制和劳役制农民为10 172 417人，占94.65%^①。到1857~1858年的第十次人口调查，欧俄47省的男性农奴为10 972 919人，而男性代役制和劳役制农民共计9 797 628人，占89.29%^②。由此可见，代役制和劳役制是俄国农奴制的主要剥削形式。

代役制和劳役制在欧俄地区的分布并不均衡，而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只有北部和中部非黑土区是以代役制为主，其他均由劳役制占主导，而且越往南劳役制的比重越高。19世纪50年代末，北部3省劳役制和代役制农民的比重分别为16.5%和83.5%，中部非黑土区7省为32.5%和67.5%，中部黑土区6省为73.1%和26.9%，而乌克兰6省、南方草原6省、乌拉尔3省的劳役制比重都在90%以上。总的来说，欧俄47省中劳役制农民占71.5%，代役制农民占28.5%^③。影响代役制和劳役制分布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自然因素。自然地理条件特别是土质对欧俄农业的分布有决定性的影响。一般而言，适合农业发展的地区以劳役制为主，反之则以代役制为主。而俄国农业生产条件最好的地区莫过于中部黑土区6省和乌克兰6省，这里分布着大面积肥沃的黑土，气候较为适宜，是俄国的主要农业区。在黑土区经营农业能给地主带来更多的粮食盈余和货币收入，地主更青睐劳役制。而中部非黑土区7省和北部3省土质不肥沃且气温较低，对农业发展不利，地主与其亲自经营农业，不如向农民收取代役租更为便利。

2. 经济因素。以代役制为主导的地区与非黑土带并不能完全重合。除了中

^① Кеппен. П. Девятая ревиз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 числе жителей в России в 1851 г.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857. С. 198 – 200.

^② Тройницкий А. Крепост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по 10 – й народной переписи. СПб., Типография Карла Вульфа. 1861. С. 21 – 40, 49.

^③ Ковальченко И. Д. Русское крепостн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67. С. 59, 61.

部非黑土区和北部地区以外，白俄罗斯、立陶宛、斯摩棱斯克等地区也属于非黑土带，但是以劳役制为主。这是因为当地属于传统的农业地区，工商业不发达，地主和农民除了经营农业之外很难有其他收入来源，地主与其向农民征收货币租，不如让其直接服劳役更为妥当。而在圣彼得堡省和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部非黑土区，城市密集、工商业发达，且有伏尔加河—波罗的海运河相沟通，地主投身于工商业比经营农业更为有利，农民也能从工商业和外出打工中挣得更多的非农收入，因此代役制更为便利。乌拉尔的情况较为特殊，这里土质较差、农业发展薄弱，但工矿企业众多，大多数地主农民都像工厂农民一样在地主的矿场做工^①。

3. 人口因素。南俄草原也属于黑土区，是农业生产的新兴地区。这里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较晚，农奴数量较少，导致地主经常遭遇劳动力短缺的困境。根据第十次人口调查，南俄6省区共有男性人口2 497 331人，其中男性农奴500 792人，占比为20%，而欧俄47省男性农奴平均比重为37%^②。为了发展农业和保障劳动力供应，地主几乎将自己所有农民都通过劳役制束缚在庄园内。伏尔加河中下游和欧俄东南部草原地区的情况与此类似。

4. 庄园规模。大型庄园主都是富裕的大地主，他们并不常住在庄园，而是聚集在首都或国外，对于农业生产并不关心，再加上大型庄园一般不利于严格监管，因此不少大地主仅仅满足于收取少量代役租。尽管此类大地主只占地主总数的很小一部分，但他们拥有的农奴数量极多，大大拉高了代役制在一省之内的比重。比如沃罗涅日省虽属于中部黑土区，但代役制的比重高达58.76%。这是因为大贵族舍列梅杰夫家族的巨型庄园坐落于此，他的农民全部缴纳代役租。如果将他们排除在外，该省代役制的比重将会降至34.2%，劳役制则会升至65.8%^③。而小型庄园多由地主亲自经营，他们经常干涉农民的生活，更倾向于采用劳役制。乌克兰、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曾经长时间受波兰的统治，这里有很多波兰小地主，他们几乎驱使所有的农奴服劳役。

由此可见，代役制和劳役制既是农民为地主交租的不同方式，也是地主经营庄园的两种形式，它们的分布都是地主根据自然、人口、经济等条件做出的选

^① Игнатович И. И. Помещичьи крестьяне накануне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М., Типография Товарищества И. Д. Сытина. 1910. С. 53.

^② Тройницкий А. Крепост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по 10-й народной переписи. С. 49.

^③ Игнатович И. И. Помещичьи крестьяне накануне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С. 59.

择。土质越好、农奴越少、工商业越不发达，地主就越倾向于采用劳役制，反之则更多地采用代役制。当然这并非绝对规律，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在中部非黑土区和西北部地区，二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除了地区差异之外，地主也会根据自身意愿和经济形势做出调整。

二 代役制和劳役制的实质与地主庄园的运行机制

在地主庄园内，耕地被分为地主的自营地和农民的份地，再分成彼此交错的条块田，按照三圃制由村社分配农民耕作。无论是代役制还是劳役制农民，都以份地为主要收入来源。但份地是地主分配给农民的，而非农民向地主租赁的，农民与份地之间存在依附关系。份地的这种性质导致地主与农民的经济关系具有强制性，同时又矛盾地交织在一起。

在农奴制下，法律规定整个庄园都是地主的土地（помещичья земля），都是贵族地产（дворянское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е），都是可以买卖、抵押的私有财产。庄园内的农民没有土地财产权，也没有人身自由权，这些不自由的劳动者实际上也是地主的固定资产，跟土地一样也可以买卖和抵押。为了从农民身上获取收入，地主需要将庄园内的部分耕地分给农民使用，这就是所谓的份地（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наделы）。而一旦分配后，份地便被视为农民的土地，与地主的收入没有直接的关系。地主虽会扩大或减少其规模，但一般不会没收，因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受到国家法律和民间习惯法的严格制约。政府政策的主要趋势就是保护和强化农民与份地之间的联系，比如1841年的法律限制了地主买卖农奴的权利，规定只有拥有农奴和庄园的世袭贵族才能购买农奴^①。而且即便贵族购买或租种了庄园，也不能遣散农民而不给他们分配土地，这也是非法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防止农奴在买卖中失去土地。另一方面，在农民的观念中，土地并非地主的私有财产，而应该归上帝所有，是所有耕作者的共同财产。1861年之前农民一直认为村社管辖之下的土地属于农民的集体财产，而地主只不过是外来者（尽管法律上并非如此）^②。所以农民与份地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不会因地主对农民的控制权而消解。

^① [俄]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五卷，刘祖熙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44页。

^② [俄] 鲍里斯·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页。

正因为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所以劳役制下的农民份地不能被视为农民因为给地主交租而获得的工资，代役租也不能被视为农民因为租种了地主的土地而交纳的租金。换句话说，农民不是因为真的“租赁”了地主的土地才必须为他们交租和服劳役，农民本来就是与土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们交租和服劳役更多的是因为地主拥有对他们的人身控制权。当然，农民为了改善生活、扩大生产也会在份地之外按照市场价格租赁或购买地主的土地，但这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农民获得主要生产资料的基本方式仍然是份地，这就导致地主与农民的经济关系具有强制性。在农奴制下，代役租和劳役租在本质上是地主凭借其强制权力向农民征收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而混合义务制是地主凭借其强权对农民的进一步榨取。

地主给农民分配土地和征收地租都是按照赋役单位（тягло，通常包括1名18~60岁的男子和1名16~55岁的女子）进行的。在大多数庄园，赋役单位的数量少于登记的男性农奴的一半，有时甚至比后者低10%~20%^①。地主给农民分配的土地数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庄园的大小，二是地主根据地方条件做出的选择。另外，农奴人口的增加也会导致份地的重分。

在农民的份地之外，地主亲自经营的耕地被称为其自营地（барские/господские запашки），这是地主的主要收入来源。在代役制庄园，地主依靠农民的代役租生活，地主没有或只有少量自营地，粮食生产不是地主的主要活动，地主经济基本上是消费型的经济。而在劳役制庄园，地主直接掌握着大量的自营地，强迫农民为其无偿耕作，是俄国商品粮的主要提供者。

地主对自己的土地的理解具有两重性和矛盾性：从法律角度看，地主实际上用自己相当一部分土地供养了一大批不一定具备劳动能力的农民作为劳动力，其生产成本十分高昂；而从农奴制下的现实经济视角看，这些土地和劳动力又都是免费的，农奴用自己的劳动在地主的自营地上无偿为其创造利润（或者直接为其提供收入）。这种矛盾性十分耐人寻味，根源在于农奴制下法律并没有对农民的土地权益做出明确的规定，而是强化了他们对土地的依附性。

一般而言，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主土地指的是其自营地，而非其全部土地。大多数地主默认了农民对份地的使用权，而将自营地作为地主经济之本，习惯于不将份地和劳动力视为生产成本，而认为庄园的生产没有成本，农奴都在为他们无

^① Заблоцкий – Десятковский А. П. Граф П. Д. Киселев и его время. Т. 1. С. 276.

偿劳作^①。这样，地主养成了依靠别人生存的观念，并将农奴制视为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

三 代役制和劳役制的特点与变化

地主掌握着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人身控制权，无论代役制还是劳役制农民，都不得不听从地主的管束。相对而言，代役制农民的生活状况要好很多。地主对他们经济活动的干涉较少，农民拥有较大的经济自主性，有较为充足的时间照看自己的土地、发展手工业或者外出打工。

在代役制下，虽然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是农业，但是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是依靠自己的份地，而是依靠手工业和外出打工获得收入。这样农民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了，特别是在莫斯科周边地区，很多农奴只是名义上的农民，他们继续缴纳人头税，继续与村社保持联系，但已经不再从事农业劳动，而是去工厂做工或充当贩夫走卒，以此挣得代役租。农民的非农收入也迅速增长，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到19世纪50年代，莫斯科省的男性代役制农民人均农业收入为22.29银卢布，副业收入为21.8银卢布，二者已经旗鼓相当；而农民的人均代役租为11.4银卢布，仅为副业收入的一半^②。这表明莫斯科省农民仅靠外出务工所得便足以缴纳代役租。但是在工商业较为落后的地区，农民无法做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地主的代役租收入也越出了农业的范围，将工商业者的一部分利润收入囊中，表明了地租来源的扩大。地主征收代役租并没有一定标准，而是会考虑农民的收入情况和支付能力，所以富农交租更多而贫农较少。特别是在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地主通常向富农征收远远超过一般水平的代役租。例如在著名的工业村——下诺夫哥罗德省伯格洛茨克村，1858年农民的最低代役租是25银卢布，但其中75人的人均代役租为30~95银卢布，53人为100~195银卢布，24人为200~375银卢布，还有9人为500~1530银卢布^③。这表明地主大量吸食了

^① Daniel Field. *The End of Serfdom. Nobility and Bureaucracy in Russia, 1855 - 186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1976. p. 27.

^② [俄] Б. Н. 米罗诺夫:《帝俄时代生活史》(上册),张广翔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76页。

^③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С. В. Разложение крепост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 в России в 1800 - 1860 гг.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каторжан. 1932. С. 174 - 175.

工商业者的利润，使代役租具有了双重寄生的性质^①。

与代役制相比，劳役制为地主提供了更多的监管农民的机会，这些监管通常极其细微而严厉，并伴随着大量的随意惩罚。劳役制农民必须为地主耕作，并将地主的粮食免费运输至码头和销售市场。他们缺乏经济自主性，处处受制于地主的权力，不得不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在农业中，无法轻易脱身去发展多种经营，工商业不发达，副业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较低。

保罗一世以前，农民为地主干多少活全凭地主本人的意愿。1797年4月5日保罗一世登基时颁布《三日劳役宣言》，规定一周之内地主不能在周日强迫农民工作，一个赋役单位的农民为地主干活的时间不能超过三天，剩下的时间要为自己干活。这种劳役量也被称为三日劳役制（трёхдневная барщина）。但在地主的抵制下，它几乎成为一纸空文。18世纪末三日劳役制是最常见的，但超过此限度的也屡见不鲜。19世纪上半期，黑土区的许多农民要为地主服劳役每周四天。而且在地主的调配下，农民服劳役的时间也并非平均分配，而是夏季最多冬季最少，而夏季正是农忙时节。所以农民负担的实际劳役量比劳役时间显示的更多。

不仅如此，地主还会根据工作内容增加农民的劳动强度。18世纪末农民服劳役以计时劳役制为主，但是到19世纪上半期任务制（урочная система）越发普遍^②。这时地主不再单纯计算农民的劳役时间，而是计算男子、妇女和役马的工作量，于是农民服劳役的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强度大大增加。这时农民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完成地主指定的任务，然后才能做自己的事情。在农忙季节，农民甚至会夜以继日地劳作，即白天为地主干活，晚上为自己干活。因此劳役制农民比代役制农民对地主的依附性更强，生活状况更差。

总的来看，在代役制下地主收入的直接来源是农民而非土地，地主更重视的是农民；而在劳役制下地主看重的是肥沃的土地，农民只不过是劳动力。因此代役制地区的农奴价格比劳役制地区更高，而且随着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二者的差距更大。据估计，19世纪中期中部非黑土区的农奴价格平均为50.4卢布，而在中部黑土区为20.4卢布^③。

^① [苏] 察哥洛夫：《俄国农奴制解体时期经济思想概论》，厉以宁、赵辉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② Ковальченко И. Д. Русское крепостн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С. 278.

^③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С. В. Разложение крепост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 в России в 1800 – 1860 гг. С. 195.

四 代役制和劳役制的消长趋势

在1762年废除贵族的强制服役以前,贵族不得不常年在外地担任军官或文职,几乎无法居家照料庄园,因此多采用代役制。摆脱了强制义务之后,大多数贵族并没有返乡直接经营庄园,而是继续居住在城市或担任公职,将庄园托付给管家打理,继续满足于向农民收取适当的代役租。这种方式简便易行,既让贵族摆脱了琐碎的经济事务,又可以根据需要提高代役租。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代役制非常普遍,以至于女皇担心这会危害农业的发展。但是大约从18世纪末开始,贵族加强了对庄园经济的干预力度,劳役制逐渐强化。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俄国价格革命和工商业政策刺激了粮价的上涨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促使贵族越来越多地生产商品粮。价格革命后,俄国的粮食价格大幅飙升,18世纪下半期便增加了2倍有余,用于出口的粮食价格也普遍上涨,对于贵族来说经营农业比工业更加有利可图^①。同时俄国政府的政策也有利于商品农业的发展:1754年废除了国内关税,1766年允许出口粮食,并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获得黑海沿岸的肥沃土地和优良海港。19世纪上半期西欧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扩大了俄国粮食的国外市场。特别是1846年英国废除粮食关税后,市场行情好转、需求扩大,再次促进了俄国的粮食出口。俄国国内的粮食市场一直在扩大。从18世纪80年代末至1861年前夕,通过水路和畜力运输运到莫斯科的粮食从55.4万俄石^②增至281.9万俄石,增长了4倍,运到彼得堡的粮食从102.2万俄石增至364万俄石,增长了2.5倍^③。因此,作为商品粮的主要提供者,地主经营庄园的趋势是大量毁林开荒,扩大农业生产,并且尽可能地代役制转变为劳役制,增加地主的自营地,让农民更多地为地主劳作。

第二,劳役制比代役制对农奴的压制和管束更加严厉,在经济上更有效率,给地主带来的收入也更多。我们经常以为,农民的自由越多,其工作的效率越

^① Миронов Б. Н. Хлебные цены в России за два столетия (XVIII—XIX вв.) .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5. С. 54—55, 169—188; 张广翔:《试论18世纪俄国价格革命的影响》,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3期。

^② 俄石,即切特维奇(четверть),俄国容量单位。装散体物时等于209.91升,1切特维奇黑麦相当于8.9普特(约145.79公斤),1切特维奇燕麦相当于5.7普特(约93.37公斤)。此外切特维奇还可以作为面积单位,即1200平方俄丈,等于半俄亩。

^③ Ковальченко И. Д. Русское крепостн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С. 93.

高，但农奴制时代俄国的情况完全相反。俄国的农民生活在自然经济之中，只想满足基本需求，不愿意尝试新事物，也不愿意创造更多的利润；他们认为生活的目的不是在于财富和荣耀，而是在于灵魂的救赎，在于简单地遵循传统，延续以往的生存方式^①。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农民的生活简单而散漫，农业劳作往往随意和漫不经心。但是随着农民身上背负的租税愈发沉重，他们也不得不更加辛勤地劳作，其经济效率反而越高。所以从耕种效率和粮食收成来看，劳役制农民高于代役制农民，代役制农民则高于负担更轻、生活更自由的国有农民^②。确实，在地主的严密监管和惩罚威胁之下，劳役制农民尽管会偷懒懈怠消极抵抗，但其工作量比代役制农民更多，地主可以获得更多的粮食和收入。1809年俄国自由经济协会曾经组织专家比较了劳役制和代役制的收益性，结果所有人都认为劳役制比代役制对地主更为有利。比如在奥廖尔省，劳役制下每个赋役单位的农民能给地主带来106纸卢布的收入，而代役制农民只能带来不超过30纸卢布，不足前者的三分之一^③。所以农业的发展让地主更多地采用收益更高的劳役制。

第三，货币贬值和农民欠租影响了代役制地主的实际收入。1769年纸卢布（ассигнационный рубль）取代银卢布（серебряный рубль）成为俄国主要货币。但随后俄国政府大量超发纸币，推动了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起初纸卢布与银卢布等值，到1800年1银卢布能兑换1.53纸卢布，到1815年为4.21纸卢布，到1840年为3.5纸卢布^④。1843年俄国开始发行新纸币——信贷券（кредитный билет），但它也像以前的纸卢布一样贬值。1854~1861年间1信贷卢布能兑换91~93铜戈比，已经无法与银卢布等值了^⑤。而从1771~1780年到1851~1860年俄国粮价增长了1.34倍^⑥，赶不上纸币贬值的速度。这时代役制地主要保证自己的实际收入，就只能大幅提高代役租。但农民经常会欠租，让地主的愿望落空。19世纪上半期农民欠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例如1858年卡卢加省的欠租额

① Миронов Б. Н. Крепостное право: р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или бесспорное зло? // Крепостное право и его отмена: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СПб. ФКИЦ ЭИДОС, 2005. С. 10.

② 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册,第411~415页。

③ Струве П. Крепост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в XVIII и XIX вв. Издание М. и С. Сабашниковых. 1913. С. 91.

④ Там же. С. 117.

⑤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Ф. А. Брокгауза и И. А. Ефрона. // Под ред. И. Е. Андреевского. СПб., Семеновская Типо-Литография. 1890. Т. 16. С. 612—613.

⑥ Миронов Б. Н. Хлебные цены в России за два столетия (XVIII—XIX вв.) . С. 47.

占到代役租总额的五分之四^①。有时地主会免去农民的欠租，希望借此提高农民的生产率，催促他们按时纳租，但是欠租仍然在不断积累。在大多数代役制庄园，接连不断的欠租会使代役制难以正常运转。因此对于部分地主而言，与其催促代役制农民交租，不如将他们变为劳役制农民更为可靠。

于是，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劳役制出现了大量的增长：总体而言，19世纪初劳役制农民占农奴总数的56%，到农奴制废除前增加至71.5%^②。这种转变说明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贵族地主正在不断地调整资源分配、强化农奴制经济，农民的经济潜力被进一步挖掘出来，同时农民遭受的剥削更重了。

五 市场关系的发展对代役制经济的影响

农民为了交租，与市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代役制农民需要到市场上出售自己的粮食，或者从事手工业和外出打工，以挣得货币；劳役制农民在为自己和地主生产粮食之后，会将其出售到国内外的市场上，换回货币。因此代役租和劳役租最终都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代役制和劳役制经济都卷入了市场关系中：前者与工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后者与粮食市场密不可分。市场关系的发展对代役制和劳役制下的地主与农民经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下分而叙之。

在代役制下，地主增加收入的主要方式便是提高农民的代役租。虽然各地经济条件差异巨大，代役租的数量不一，但都出现了大幅增长的现象。为了剔除纸币贬值的影响，现代学者一般使用银卢布来计算代役租的数量变化。根据米罗诺夫的研究，18世纪80年代莫斯科、特维尔、奥廖尔、梁赞四省的男性人均代役租分别为4.8~5.8银卢布，到19世纪50年代分别增加为11.4~13.1银卢布，增幅平均为130%。与此同时，四省农民的人均农副业总收入则从19.13~22.28银卢布分别增至33.77~44.09银卢布，增幅平均为84%^③。因此从名义上看，农民代役租的增速超过了总收入，二者之比从平均25.22%增至31.69%，表明这些代役制农民受地主剥削的程度加深了四分之一左右。

为了争取更多的代役租，农民依靠手工业和外出打工挣钱，这些非农业收入

^① Нефедов С. 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Факторный анализ. Т. II. От окончания Смуты до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Территория будущего", 2010. С. 246, 256.

^② Милов Л. В., Цимбаев Н. 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VIII – XIX веков. М. Эксмо, 2006. С. 397.

^③ [俄]米罗诺夫：《帝俄时代生活史》上册，第276~279页。

越来越成为他们缴纳代役租的重要补充，这就使亦农亦工、亦农亦商乃至脱离农业的务工农民不断增加。中部非黑土区的大部分代役制农村多多少少都从事手工业，农民的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发展迅速，远远超出了当地的需求，具备了全国性的影响力。少数农村的手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它们被称为工业村。许多工业村尽管没有得到城市的地位，但在人口数量和经济实力上超过了城市。这些工业村的农民手工业活动出现了一定的专门化，一村一品的现象较为突出。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纺织、制鞋、造船、家具等行业，获得大量的收入。比如舒伊斯克县的著名工业村伊万诺沃就以纺织业闻名，19世纪40年代便有4.2万人做工，年产布料达90万匹，价值2340万纸卢布^①。在工业村中还出现了一些富裕的农奴工厂主，他们以地主的名义签订契约、买卖土地、雇佣劳动力，甚至能拥有自己的农奴，他们被称为“资本家农民”。当然无论农民还是地主都不可能自发地转为真正的资本家，因为他们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仍然是封建性的。商品生产的发展本身并不是生产方式改变的标志。

随着代役制农民的手工业大量出现，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部非黑土区和以彼得堡为中心的西北部地区成为俄国的主要工业区。到1863年，这两个地区的工业生产总值分别达到10664.8万卢布和6194.7万卢布，占欧俄总额的43.9%和25.4%^②。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只不过占欧俄的三分之一，但却产生了近七成的工业产值，由此可见工业生产的专门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尤其是中部非黑土区已经发展成为中部工业区，其中莫斯科省成为最突出的工业省份。

除了手工业以外，代役制农民还可通过外出打工挣得代役租。在19世纪50年代莫斯科省的地主农村，有7.11万人得到了外出打工的身份证，占男性人口的25.5%；弗拉基米尔省有5万人，占15.9%；雅罗斯拉夫尔省有2.8万人，占11.5%^③。与国有农民相比，工厂主更愿意雇佣地主农民。这些务工农民有的是地主委派的，有的是独自出去的。在1835年之前，地主可以在任何时间要求代役制农民从工厂回到庄园，而在此之后，法律规定地主只能在农民的身份证到期之后要求其返乡，这样农民外出打工就更加自由了。除了在工厂做工以外，代役制农民还广泛从事杂工、马车运输、货郎、商贩、伙计、纤夫等行业，其行迹甚至遍布全国。而他们离开后，家务和农活主要依靠妇女完成。

① Игнатович И. И. Помещичьи крестьяне накануне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С. 91 – 92.

② Ковальченко И. Д. Русское крепостн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С. 69.

③ Там же. С. 86.

总的来说,随着代役制农民积极参与工商业,农民经济活动的多样化趋势加强了,非农业收入对他们愈发重要。例如从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中期,非黑土区的莫斯科、特维尔和黑土区的奥廖尔、梁赞四省男性代役制农民的人均副业收入均出现了迅猛增长,增幅达1.7~2.5倍,不仅远超农业收入的增速,而且超过了代役租的增速^①。我们没有必要像有些学者那样夸大代役制农民参与工商业的程度,认为“代役租总额失去了与份地的联系”^②,但可以肯定地说,随着代役制农民不断地卷入商品经济之中,农民对土地的实际依附降低了,农民的实际自由扩大了,他们遭受的人身束缚被削弱了。而且在手工业领域,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扩大、产品的销售都与传统的农奴制经济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手工业的广泛发展意味着大量农民在经济意义上脱离了封建农奴制生产方式。而且手工业在农民经济中的作用越大,这种摆脱的程度就越大。所以随着农民手工业和其它工商业成为农民的主要经济活动之一,农奴制经济的制度基础受到了削弱,而农村中新的社会关系得到了发展。这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农奴制的真正危机。当然,这种发展并不是代役制的功劳,而是农民经济本身活力的表现。农民经济在商品生产发展中的贡献巨大,如果没有强制性的代役租,农民的经济状况会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保留农奴制的剥削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

六 市场关系的发展对劳役制经济的影响

首先,提高了农业的商品率,促进了商品农业的出现。在劳役制下,地主和农民不断地把粮食投放到市场,商品货币关系深入农村,并将触角伸到国外。俄国的粮食从18世纪末就已经卷入了国际贸易体系,其主要出口对象是英国。1791~1801年间俄国谷物的年均出口量为260万普特(1普特约等于16.38公斤),到1801~1805年增至1987.3万普特,到19世纪50年代末为6925.4万普特^③,大部分出口粮食来自于劳役制下的地主自营地。在国内市场上,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上升,俄国商品粮的规模不断扩大,商品率逐渐提高。根据科瓦里琴科的计算,19世纪初欧俄6个省份的商品粮接近粮食总产量的9%

① 米罗诺夫:《帝俄时代生活史》上册,第276~278页。

② 察哥洛夫:《俄国农奴制解体时期经济思想概论》,第39页。

③ Мионов Б. Н. Хлебные цены в России за два столетия (XVIII—XIX вв.). С. 114; [苏] 扎伊翁契科夫斯基:《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叔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8~39页。

~14%；到19世纪50年代整个欧俄地区的粮食商品率达到18%，其中以劳役制为主导的产粮区的商品率更高，如中部黑土区为19.5%，伏尔加河流域为21.8%^①。但是这些数据并不足以反映全貌，因为科氏所指的商品粮仅包括通过水路和畜力运往外省的粮食和用来酿酒的粮食，而不包括省内运输的商品粮，因此实际的粮食商品率应该更高。在粮食贸易的推动下，俄国贸易资本广泛发展，各种采购商日渐活跃，编织起了农村贸易网并掌握了农产品的销售。这也就意味着，劳役制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渐从自然经济发展成为商品货币经济，并对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第二，加重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农民经济是地主经济的基础，地主经济的活跃会加重农民负担。根据尼古拉一世时期统计学家的计算，在当时的国内粮食市场上，地主提供了90%的商品粮，而农民的粮食只占10%^②，因此地主经济的商品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劳役制的扩张和地主经济的膨胀意味着农民的部分土地被剥夺，劳役量加大。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农民份地和地主自营地明显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态势。Л. М. 梁斯基利用中部黑土区59处劳役制庄园的信息，算得18世纪末至1820年男性农民的人均份地为2.7俄亩，人均分摊的地主自营地为1.359俄亩，而1841~1860年间二者分别为2.3和1.819俄亩^③。由此可见农民份地下降了15%，而地主自营地大涨33.8%，农民的受剥削程度大幅提高。除了中部黑土区以外，乌克兰地区的地主也不断扩张自营地，导致农民的负担也尤其沉重。到1860年，乌克兰6省的地主自营地的播种面积超过了农民份地的播种面积，纳税农奴的人均播种面积只有1.2~1.6俄亩^④。在农奴人口开始停止增长的情况^⑤下，日渐发展的全俄农业市场和国外市场促使地主加强对劳役制农民的压榨。

第三，市场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俄国农业生产的专门化。主要表现为：

(1) 农业生产进一步向黑土区集中，劳役制进一步向南方扩张。为了生产

① Ковальченко И. Д. Русское крепостн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С. 95 - 98.

② Там же. С. 172.

③ Рянский Л. М. Эволюция социально -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крепостной деревни Черноземного центра в конце XVIII -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 . . док. ист. наук. Курск. 2011. С. 20.

④ Нифонтов А. С. Зернов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Росс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М., Изд. Наука, 1974. С. 110—115.

⑤ 根据 В. М. 卡布赞的统计，1835年俄国的各类农奴人口为2 479.43万人，1851年为2 462.68万人，1860年为2 483.82万人。见 Кабузан В. М. Крепостн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России в XVIII—50 - х годах XIX века. Численность, состав и размещение//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82. № 3. С. 76.

更多商品粮，黑土区的劳役制庄园扩大了生产规模，导致黑土区农业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和劳役制的扩张。19世纪初黑土区的人口占欧俄60.2%，粮食产量占61.5%，到19世纪50年代分别增至64.9%和70%^①。这是因为南方草原、伏尔加河中下游等南方黑土区得到开发，大批农民迁往这里，农业中心开始向南部转移。这些地区几乎全部采用劳役制，因此劳役制也扩展到南方。

(2) 农作物的变迁。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西部地区和中部黑土区的燕麦播种面积大幅增长，形成了以秋播黑麦和春播燕麦为主导的农作物播种体系。而在便于出口的南方黑土区，价格更高的小麦不断扩张。这是因为黑麦和燕麦是普通民众的主粮，主要供应国内市场，而小麦则主要用于出口。此外，西部的土豆、大麻、亚麻，乌克兰的甜菜也成为重要农作物。劳役制地区的农业生产专门化与代役制地区的工业生产一样，是为了以合理的方式满足民众需求，都是社会劳动分工加强的表现，说明市场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上升了。

第四，劳役制农民参与市场化进程，增加了收入。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劳役制农村的农业生产仍然按照传统的粗放方式发展着，农民向市场供应的主要是多余的粮食，有时农民为了获取其他生活资料不得不节衣缩食并出售部分必要的粮食。中部黑土区的农民从自然农业向商品农业的发展仅仅处于初级阶段，只是在个别地方出现了专门面向市场的商品农业和商品畜牧业。不过市场的扩展提高了粮食价格，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总的来看，粮价涨幅超过了农奴人口和农民播种面积的增长，成为推动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力。例如1835~1859年中黑土区的男性农奴人口降低了0.1%，西乌克兰增长了4.6%，东乌克兰降低了3.6%^②，而从1842~1850年至1851~1860年，中部黑土区农奴农民的年均播种面积增长了2%，西乌克兰降低了16.3%，东乌克兰增长了15.4%^③，同期三地的粮食价格指数分别增长28.5%、35%、42.3%^④。因此粮食市场和商品经济的扩展给农民经济带来新的活力。尽管如此，劳役制农民也不可能大量的资金，他们虽然通过出售粮食获得一定的收入，但一旦遭遇歉收或家庭人口增加，他们的生活就会陷入窘迫，因此他们的简单生活实际上是一种脆弱的平衡。

① Ковальченко И. Д. Русское крепостн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С. 68.

② Кеппен. П. Девятая ревиз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 числе жителей в России в 1851 г. С. 199—200; Троицкий А. Крепост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по 10-й народной переписи. С. 49.

③ Ковальченко И. Д. Русское крепостн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С. 83.

④ Миронов Б. Н. Хлебные цены в России за два столетия (XVIII—XIX вв.). С. 54—55.

结 语

我们习惯于将俄国的农奴制视为强制性的罪恶，这诚然是不错的。不过从本文的分析来看，农奴制剥削形式的分布不仅适应了俄国的自然、人口和经济条件，而且还会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此外，市场关系的发展在促使地主进一步压榨农民的同时，也刺激了代役制农民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各类工商业中，促进了工业区的形成，而劳役制地区农业生产商品化和专门化程度提高，农民的收入也有所增加。由此可见，农奴制经济并非完全僵化和停滞不前。

当然必须承认，经济的发展不是农奴制的功劳，而是农民克服了农奴制的压迫和束缚而创造出来的成果。西方有些修正主义观点认为，俄国农奴制适应了经济环境，在很多方面有利于原始工业化的展开，因此并非经济发展的障碍^①。这种观点是很片面的。最近的研究表明，即便是在农奴负担较轻、地主管理较为有序的大型代役制庄园，农奴制的存在仍然造成农民经济发展的“等级天花板”，因为地主的政策无法融入更大范围的法律架构之中，农民缺乏正式的法律权利，无法抵抗地主的不合理决策和维护自己的财产^②。笔者认为，农奴制的存在毫无疑问严重压制了农民经济的活力，而农民的积极性正是促使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重要力量。地主经济的寄生性让农民不堪重负，特别是在劳役制地区，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农奴制越来越不合时宜，其废除也是必然的。

在俄国1861年改革中，以代役制取代劳役制、以自由劳动取代强制劳动，成为废除农奴制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这也是代役制和劳役制的不同特点决定的，只有废除劳役制，废除地主对农民的种种强制权力，农民才有可能获得人身自由。但是改革后代役制取代劳役制的进程极其缓慢，到19世纪80年代，欧俄43省中有17个省仍然以劳役制为主导^③，可见消除农奴制残余何其艰难。

（责任编辑 张红侠）

^① Richard L. Rudolph,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nd Proto - Industrialization in Russi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free Labor",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5, No. 1 (Mar., 1985), pp. 48.

^② Dennison T. K. "Did serfdom matter? Russian rural society, 1750—1860",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79, No. 203 (February 2006) . pp. 83—89.

^③ [俄] 察哥洛夫：《俄国农奴制解体时期经济思想概论》，第26页。